

近代

汉语虚词

研究

刘坚
白维国
江蓝生
曹广顺

语文出版社

JINDAI HANYU XUCI YANJIU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

刘 坚 江蓝生
白维国 曹广顺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74 号

JINDAI HANYU XUCI YANJIU

近 代 汉 语 虚 词 研 究

刘 坚 江蓝生

白维国 曹广顺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邮 政 编 码：1000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1.25 印张 250 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5.50 元

ISBN 7-80006-448-4/H·112

前　　言

最近十多年，是近代汉语研究的兴盛时期，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出了不少成果，及时把这些成果加以总结、归纳，可以推动今后的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基于这一想法，我们把最近十年中在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方面的一些心得整理出来，以向同行和广大读者请教。

近代汉语这一名称，是最近十多年才在语言学界通行开来的，语言学界以外的同志对于这一名称恐怕还比较生疏，因此我们在全书开头的绪论部分扼要介绍了关于划分近代汉语历史年代的几种有代表性的意见，介绍了近代汉语的主要文献资料，以及建国以来近代汉语研究的概况和研究方法，希望通过以上的介绍使读者对这一研究领域有个大概的了解。

在虚词专论部分，重点讨论了二十九个虚词，连同附带涉及的七个，共有三十六个。其中以在动态助词和疑问副词方面着力较多。这些专论有的篇幅较长，为了帮助读者掌握要点，这里先简要介绍所论各章节的主要内容。

助词类下分动态助词、事态助词、结构助词、语气助词和概数助词五类。其中动态助词讨论了“却”“了”“将”“得”“取”“着”“过”七个。

却、了 唐初“却”出现在“动+却+宾”格式中，已从动词转变为动态助词，改变了汉语完成态表示法，产生了一个新的语法范畴。中晚唐以后，受到“动+却+宾”格式的影响，“动+

宾 + 了”式逐渐向“动 + 了 + 宾”式变化，“了”字开始转变为动态助词，这个过程完成于宋代。

将 “将”是由“挟持”义的动词发展成助词的。虚化的第一步是用在跟它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动词之后，组成连动式或述补结构，在表示“结果”这个总的语义下，以多种语法格式分别表达完成、持续等多种语义；宋代以后，语义迅速趋向单纯表达动作的完成，语法格式也逐渐统一为“动 + 将 + 补”。

得 唐代已见“得”作动态助词，表示动作的持续或完成。主要有“动 + 得 + 趋向动词”和“表示趋向的动词 + 得 + 处所/时间名词”两种格式。清代中叶，表示动态的“得”逐渐被“了”“着”取代。“得”与“将”在用法上有一些不同。

取 助词“取”的演变过程跟“将”相近。它是专门表达语法意义的虚词，但它在分布上又没有自己独具的特点，所以后来被语言实践所淘汰是毫不奇怪的。

着 “着”由“附着”义的动词虚化为表示持续态的助词，约成熟于唐代。它前面的动词分为动作本身可持续的和动作本身虽不能持续，但产生的结果是可持续性的两种。其发展大致经历了（1）跟在某几类特定动词之后表示附着性结果；（2）跟在一般动词后面表示动作的结果；（3）表示动作状态的完成、持续以及进行这样三个阶段。

过 助词“过”产生于唐代，主要表示动作的完结，宋代又产生出表示“曾经”的用法。“过”的语义变化和发展过程受到当时助词系统中相关的几个助词（却、了、来）的相互影响和制约。

事态助词讨论了“了”“来”“去”三个词。

了 即通常所说的了₂。用在句末，主要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将要出现变化，有结句的作用。“了”本是动词，它发展为事态助词是通过“动 (+ 宾) + 了”和“动 + 却 + 宾”两种表示完

成态的格式的共同影响而完成的。唐以前汉语完成态句式是“动+完成动词”(如“讫、毕、已”等)。唐以后动词“了”进入这一格式，这一格式逐渐统一为“动+了”，“了”并获得了用于句末的位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唐五代时该格式与“动+却+宾”格式合并而成“动+却+宾+了”式。第三步，宋代随着动态助词“了”(₁)取代“却”的趋势，就产生了“动+了₁+宾+了₂”的格式。

来 “来”表示事件曾经发生过，是表示“曾然”的事态助词，产生于唐代。它的语法位置在句子或分句的末尾。“来”的历史表明它是汉语固有的助词，不可能是蒙语借词。

去 “去”跟事态助词“了”“来”的语法位置相同，总是出现在句子或分句之末。它的功能跟“了”相近，主要表明事态的“已然”或“将然”。“去”跟“了”的区别在于“了”在早期更侧重于表示“已然”。

结构助词主要讨论了一直沿用到现代的“底”“地”和现在只在少数方言中使用的“来”和“得来”。

底、地 在唐五代的文献里，这两个结构助词的使用没有清楚的分界。“底”字的使用特点表明它跟“者”字之间有来源关系。宋代以后“底”“地”先后变成了“的”。

来、得来 现代吴语里的结构助词“来”始见于唐代，“得来”始见于宋金。“得来”是“得”和“来”的叠用。“来”和“得来”不是吴语所独有的结构助词，但不带补语的B式只出现在现代吴语中。不带补语的B式是带补语的A式的省略。动词“来”虚化为结构助词的义理跟“得”相类。

语气助词只讨论了一个“呢”，着重探讨其表示疑问的用法及来源。结论是：现代汉语表示疑问的语气词“呢”来源于“尔”。这在上古有《公羊传》《谷梁传》的例子；六朝有各类小说的例子；五代《祖堂集》里作“聾”“你”“尼”；北宋《景德传灯录》中

作“你”“那”；元明以后“呢”字渐多，大致可以建立起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联系。

概数助词“以来”、“来”“来”是“以来”的省用。“以来”在唐代以后不只表示时间的范围，又扩大到表示处所、事物乃至人等的范围，所以它又用于表示数量的范围（即概数）是顺理成章的。“以来”和“来”最初只表示不超过某数，到后来才可兼表比某数略多或略少。文中还对比了“以来/来”跟唐以前表概数的“许”和现代表概数的“来”在位置、格式上的演变关系。

在介词、连词部分讨论了“和”“共”“连”和“吃”“打”五个词。

和、共、连 从“和”字在文献资料中的实际用法来看，它在唐代已开始由动词发展为连词，在宋代发展为介词。“共”在唐代只作介词，宋代以后又作连词，后来渐被“和”所取代。现代汉语表示“连带”和“甚至”义的介词“连”至迟在宋代已经出现。

吃（喫） “吃”是口语里表示被动的介词，至迟在北宋就已出现。它源自动词“喫”的引申义“遭受”“蒙受”。虽然它在元明文献中又写作“乞”，但这个“乞”只是“吃”的音借字或省旁字，跟现代闽南话里兼表给与和被动的“乞”不是一个来源，跟动词“给”在语音上也没有来源关系。

打 介词“打”最早见于南宋辛弃疾词。其用法依时间先后为：(1) 表示空间的经由（宋元）；(2) 表示空间的起点（约十六世纪）；(3) 表示时间的起点（约十八世纪）。由“打”组成的复合介词除“打从”最早见于元代外，其它如“自打”“打自”“从打”“由打”等出现更晚，这说明介词“打”的功能不是从“打从”这一复合介词中获取的。介词“打”最有可能是从动词“打”虚化而来，即“打”有捶击、冲撞义，由此引申为顶着，冲着等

朝向义；当朝向义的“打”后面出现处所名词，并再在处所词后面出现一个表示经由或趋向类的主体动词（打+处所名词+动）时，“打”就具备了虚化为介词的条件。

副词部分讨论了疑问副词和禁止副词两类，其中疑问副词讨论了“颇”“可”“还”“莫”四个，附带涉及了“岂”“宁”“为”“敢”四个词。

颇 “颇”盛行于六朝，直到晚唐以前仍然使用。它用在“vp不？”式反复问句和句末带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句里，表示中性的疑问。

可 “可”从汉代到唐初只表示反诘问，中晚唐始见表示中性的疑问，但并不多见，且所跟动词多限于“能”“是”。表示中性疑问的“可”的大量使用是在元明以后。

还 “还”盛用于晚唐五代，它在明清以前只表示中性疑问和选择问，明清时始见用于反问句。

从来源上看，“颇”与“可”有关。“可”本为助动词，在一定的语境中产生出疑问副词的用法。“颇”即“叵”，为“不可”的合音，在用法上“颇”与“可”呈互补状态。“还”与六朝时候的疑问副词“为”是替代关系，替代的基础是“还”与“为”在语义上有共同点。

莫 “莫”表示测度疑问，先秦已见其例。其语义的实质是表示不确定的肯定，并非真性疑问，在这方面跟以上三个疑问副词有明显的区别。

别 禁止词“别”是“不要”的合音。明代文献中“别要”多于“别”，“别要”是“不要”合音发生音变的反映。“别”读阳平，是“别要”连读音变的结果。

词缀部分讨论了唐五代特有的代词前缀“是～”，以及形容词性的后缀“～生”。

是～ “是”加在某些疑问代词和三身代词之前，前者如“是

物”“是底”，后者如“是我”“是你”“是他”。前缀“是”是从系动词“是”发展而来，是为了加强疑问代词的疑问语气和加强三身代词的指示性而使用的。前缀“是”只通行于八至十世纪左右。

～生 “生”是个形容词性的后缀，唐五代时候，它不仅用在形容词后面，也用在名词、动词（包括词组）之后，表达事物的情貌、状态。宋以后，用在分句、句子后面的“生”已经具有语气词的性质了。

汉语的特点决定了虚词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对上述近三十个虚词的探讨，可以窥见近代汉语语法面貌之一斑，也能从中总结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现从以下五点简要说明。

(一)唐五代是汉语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内出现或确立了许多新兴的语法成分、语法范畴。比如现代汉语里的动态助词系统“了”“着”“过”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和渐趋成熟的。联系到现代汉语的三身代词系统（我、你、他）是在唐代确立的；指示代词的二分系统（这、那）是在晚唐五代确立的；现代汉语最通用的疑问代词“什么”的前身就是唐五代文献里先后出现的“是物”“是没”“甚摩”“什摩”等；表示复数的词尾“们”虽然始见于宋代，但唐代文献里已出现其前身“弭”和“伟”等（详见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这些事实都说明，把晚唐五代作为近代汉语历史年代的上限是比较合适的。

(二)在近代汉语时期，助词系统的发展极为活跃，呈现出纷繁交错的状态。表现在：(1)往往同时出现两个和两个以上的相同语法范畴的一组虚词，比如动态助词有“却”“了”“将”“得”“取”等，事态助词有“了”“来”“去”等，结构助词有“得”“来”等（当然它们的出现和地位有先后主次之分）；(2)一个助词在承担某一主要职能之外，还往往同时兼有它种功能。比如“得”

既作结构助词，又兼作动态助词；“着”既表持续态，又可表完成态；“来”既作结构助词，又可表完成态，偶或也表持续态。这种既重复又分工不明的状态不能适应语言交际的需要，因此在语言向精密化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助词系统内部的竞争和协调，淘汰其赘余成员，逐渐形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局面。

(三)汉语的虚词一般是从实词发展变化而来的，通过对实词虚化过程的探讨，可以看出虚词的语法意义大都跟它所来自的实词意义有关，只不过有的语义关系比较直接（如“了”“着”“和”），有的语义关系不那么直接（如“吃”“打”）就是了。此外，一个实词的虚化往往跟它所结合的词的类别和意义有关，跟它在句中所处的位置或语境有关，因此在探讨实词的虚化过程时不能脱离开以上诸因素进行。

(四)相同语法范畴的虚词，在语义、功能等方面必然要受到该系统中相关虚词的影响和制约，比如动态助词“了”的产生，就受到先于它产生的动态助词“却”的影响；疑问副词“岂”自上古至唐代都是兼表反问和中性疑问的，“可”最初只表反问，中晚唐开始兼表中性疑问，到了明清以后逐渐调整为“岂”专表反问，“可”专表中性疑问。因此把一个虚词放到它所属的系统中去考察，比之于孤立地研究单个虚词视野更开阔，也更便于找到问题的症结。

(五)在虚词研究中，要注意区分新的语法成分的出现和虚词替代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语言现象。比如唐初在“动+却+宾”式中，“却”字由动词转变为动态助词，这是新的语法成分的出现。中晚唐以后，“了”受“却”的影响，由“动+宾+了”变为“动+了+宾”式，“了”也变化为动态助词，这则是一种词汇的兴替现象。再比如唐五代时，“动+了”与“动+却+宾”两种格式合并为“动+却+宾+了”，产生了一种新的句型，句末的“了”（即₂了）是新的语法成分——事态助词；而宋代的“动+了₁+

宾 + 了₂”，其中的了₁则是虚词的替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比较注重材料的搜集和选择，特别注意引用某个语法成分，某种语言现象出现的最早或较早例句，同时也很注意那些反映某一成分由量变发生质变的材料，力求以可靠材料为依据，力求立论有新意。由于本书不是一部全面、系统讲述近代汉语虚词的专著，所以凡是前人已经论及的虚词，而我们在材料和结论上没有什么不同的，这里概不收录。

为了帮助读者利用最近十年来近代汉语研究的各项成果，本书在第三部分详列了国内外有关论著的索引。专著在前，论文在后，论文以通论、语法、词汇、语音、校勘等为序，其中又把论题相同或相关的排列在一起，这样查阅和利用起来可能要方便一些。由于条件所限，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论著肯定都会有一些遗漏，这里只能请求作者和读者原谅。

这本书由我们四人分写，在体例和内容上定有照顾不周之处；而且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肯定会有叙述疏漏和结论不当之处，这些都恳请读者和同行们批评指正。要写出一部比较全面的近代汉语语法，进而写出一部全面的汉语语法史，需要有很多人共同努力，但愿这本小书能为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增添一砖半瓦。

作 者

1990年4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绪 论	(1)
(一) 近代汉语的历史年代划分	(1)
(二) 近代汉语文献简述	(4)
(三) 建国以来近代汉语研究综述	(20)
二、虚词专论	(43)
(一) 助词	(43)
1 动态助词	(43)
却 了	(43)
将	(58)
得	(69)
取	(83)
着	(95)
过	(103)
2 事态助词	(111)
了	(111)
来	(121)
去	(129)
3 结构助词	(138)
地 底	(138)
来 得 来	(146)
4 语气助词	(166)
呢 (哩)	(166)
5 概数助词	(182)

以来	来(182)
(二)	介词、连词(198)
和	共	连.....(198)
吃	(乞)(210)
打	(224)
(三)	副词(234)
1	疑问副词(234)
颇	可(岂、宁、敢)	还(为).....(234)
莫	(260)
2	禁止副词(265)
别	(265)
(四)	词缀(276)
是～	(阿～)(276)
～生	(282)
三、	近代汉语论著索引	(1978—1989).....(287)
(一)	专著(287)
(二)	论文(289)
1	通论(289)
2	语法(294)
3	词汇(307)
4	语音(327)
5	校勘及其他(337)
附:	主要引用书目(343)

一 緒 论

(一) 近代汉语的历史年代划分

近代汉语是汉语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近代汉语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它的上限和下限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首先遇到的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语言学界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1 王力早在50年代首先提出“应该以语法作为主要的根据”来看待语言发展，而“语音和语法有密切关系，……都是整个系统，所以语音的演变也可以作为分期的标准”。“一般词汇的发展，也可以作为分期的标准，但它不是主要的标准”。按照这些标准，他提出“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近代汉语的特点是：(1) 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的消失；(2) -m尾韵在北方话里的消失；(3) 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等等”。(《汉语史稿》上册，34—35页，1958)

潘允中的意见与王力比较接近。他认为“自宋元明清至鸦片战争以前，是汉语史的近代时期”。“在这期间，动词词尾‘着’‘了’，形容词词尾‘的’，副词词尾‘地’，都已经普遍使用，日趋于规范统一。由古汉语发展而来的句末语气词‘么’‘吗’‘呢’‘哩’‘呀’，在近代书面语言里已广泛出现……”。他还举出了这个时期句法上的一些发展。(《汉语语法史概要》，17页，中州书画社，1982)

2 吕叔湘论证这个问题时，先肯定了“把五四时期定为现代汉语开始的时期是合理的”。然后把五四时期以前的语言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时期。他说，“尽管从汉魏到隋唐都有夹杂一些口语成分的文字，但是用当时口语做基础，而或多或少搀杂些文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的（如禅宗语录和敦煌俗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他还指出，“尽管我们说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我们却不认为把汉语史这样平分为三段是适当的。我们的看法是，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的”。（《近代汉语读本》序，1983）

1984年，吕先生在《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的序里重申了这一看法。他说，“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但是以口语为主体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的地位。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

由此可以看出，吕先生主要是从文言和白话的消长，综合了语法和词汇标准，来划分近代汉语这一历史时期的。

3 吕叔湘的看法发表以后，引起了近代汉语研究者的重视，1986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近代汉语研讨会上曾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杨耐思、袁宾的意见后来写成专文发表。杨耐思认为：“语音、词汇和语法三者的发展不平衡，所以近代汉语的上限与下限不能一刀切”。他同意近代汉语大致上是“晚唐五代到清代的

一千余年”。（《加强近代汉语研究》，《语文建设》1981，1）袁宾提出，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不采用划线切分规定上下限的方法。他认为，汉语历史阶段由主干部分和交替重叠部分组成，以南宋、元、明、清初为近代主干，上下可推延几个世纪。（见《论近代汉语》，《广西师大学报》，1987，1）

胡明扬在研讨会上详细论述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近代汉语的上限不晚于隋末唐初，下限不晚于《红楼梦》以前，《红楼梦》对话部分反映的口语应该是现代汉语。他提出的分期标准是：（1）语音上阴阳入对应的严整格局开始动摇，入声韵尾-p，-t，-k从相混到消失；全浊声母的消失；-m韵尾的消失。（2）语法上“的”、“了”、“哩/呢”的出现和全面代替旧的助词系统；“这、那”替代“彼、此”；“将/把”字句的出现和发展；“动+将+趋”的出现、发展和消失。（3）语汇中“我、你、他”（还有“们”）的出现和全面替代“吾、汝、其”等古汉语人称代词。

蒋冀骋不同意“隋末唐初”说，他举出许多语言事实，认为胡明扬的说法不能成立。他也不同意王力的十三世纪上限说，认为王力概括的三个特点中，“至少有两项（如全浊声母、入声韵尾的消失）并不是在元代才出现的。”他同意吕叔湘的意见，但并不同意古代、近代二分的说法。蒋冀骋的意见是把晚唐五代到明末清初（九至十七世纪）划为近代，他的分期标准是：

（1）音韵上，轻唇音已分化；舌上音已与照三合流；全浊声母、入声韵尾开始消失；-m韵尾开始动摇。

（2）词汇上，方言俗语大量使用；“头、子、老、打”等构词成分的出现和大量使用；双音词增多；新义大量出现；外来词大量进入。

（3）语法上，出现了新的指代词，新的语气词，被字句、把字句有了新的发展。（以上见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杭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

目前对近代汉语历史年代划分问题的讨论还没有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但是大部分近代汉语研究工作者倾向于接受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晚唐五代前后，下限定在清代前后的意见。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待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对近代汉语的描写将会更加细致和充分，分期问题也将得到明确的答案。

（二）近代汉语文献简述

我们研究古代汉语，跟研究现代汉语有一点不同：研究现代汉语，除了依靠书面材料以外，还可以直接分析活在现代人口头上的语言材料；而研究古代汉语，却只能依靠古代留传下来的书面材料。换句话说，研究现代汉语，既可以研究书面语，也可以研究口语；而研究古代汉语，则只能研究古代书面语，尽管这种书面语本来也是拿古代口语做基础的。

汉语从有文字记载算起，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汉语的书面语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么长的时期内，书面语反映口语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诗经》里的“国风”是民间口头文学的记录，《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录下来的当时的言谈，应该都是比较接近口语的。即使像《尚书》那样，在今天看来非常古奥难懂的文章，在当时也该是距离口语不远的。只不过在汉魏以后，写文章的人往往沿袭和模仿先秦的语言，书面语跟口语的距离才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称为“文言”的书面语，在书面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一直延续了约两千年之久。我们今天所说的“古代汉语”，实际上就是指的这种文言；就连先秦那些本来比较接近口语的书面记载，因为它跟现代的语言差别太大，也归